

●黄绍杞

新时期图书情报领域若干问题探微

ABSTRACT The library world of China at the moment pays an undue attention to the forms of the library literature and lays less stress on the content of them. This is contrary to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adapt the library to market economy, it must deeply exploit the content of literature and make the library itself become a "blood forming" substantive being.

SUBJECT TERMS Library science—Relations—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literature development—Studies

CLASS NUMBER G250.05

图书与情报该分道扬镳

1992年9月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一词正式改为“科技信息”。之后,科委系统情报单位随之更名。在此前后,有些大学如浙江大学、大连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外语学院、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等的图书情报学系或专业也纷纷改名。北京师大图书情报学系也继北京大学之后改名为“信息管理系”。

科委系统情报单位改名,引起了整个图书馆界、文献信息界的强烈震动。有的兴奋、称快;有的惊诧、遗憾。前者多系图书馆工作者,后者主要是情报

学者或专家。其实将“情报”改为“信息”并不意味着否定情报学及其研究者们在该领域多年的研究成果。国家科委根据国内实际,在图书情报事业处于困顿不前的关头,断然做出此项举措,实为适应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廓清了有关学科的本来面目,使“信息”、“情报”各归其位,委实功莫大焉。

“情报”和“信息”要各归其位,“图书”与“情报”也应分道扬镳。

“图书馆学”这一术语,流行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后半叶便形成为一门学科。而“信息”与“情

科研用书表现为需求的分散性、多样性、迫切性、完备性和高层次等,参考系列书库收藏了全部的馆藏文献品种,以利用率的高低及新旧程度分别设置的保存本书库,各特种文献库和教师研究生阅览室辅助书库等则可较好地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参考书目

1. 黄纯元. 我国图书馆事业战略发展的若干思考. 图书馆学基础笔会文集, 1987

2. 沈继武, 肖希明. 文献资源建设.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4

3. 肖德洪. 关于藏书建设综合治理问题的几点思考.

厦门大学第四届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讨论会文选, 1989

肖德洪 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现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 发文数篇。通讯地址: 厦门大学图书馆, 邮编 361005。

(来稿时间: 1994-02-28. 编发者: 黄文

田。)

报”其实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有学者专家研究,形成独立的学科则是本世纪50~60年代的事。情报学是在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一样,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

图书馆学本身虽然年轻,但与情报学比又较老。两者虽有紧密联系,却毕竟是两个独立的学科。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决定了它们的传统不同。图书馆以人文为本,情报学则以技术为本。两者研究的对象及发展方向也不相同。目前我国情报学作为新型学科,“纯科技情报”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它应该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的大量现成的理论、方法、手段,去研究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诸多问题。应该将经济情报、商业情报、军事情报及风情人俗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或领域。图书馆学存在拓宽广度的问题,如图书馆发展方向问题、体制变革问题、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问题、甚至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等。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有着各自的发展前景。但前一时期,图书馆学界提出的所谓“图书情报一体化”,硬把两者连在一起,言必称“图书馆学情报学”或“图书情报事业”等。实际上两者互利不足羁绊有余。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和价值要靠自己去探索和创造。80年代中期,一些学校将原来的“图书馆学系”改名为“图书情报学院”或“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时,上海大学文学院独辟蹊径,挂出了“文献信息管理系”的牌子,这不能不说有真知灼见。这两门学科较长时间格格不入,不仅在我国如此,在国外很久以前就成为一个棘手问题。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J·H谢拉(1903~1982)在60年代末曾这样描述过两门学科的不和谐关系:“情报学并非图书馆工作的对立面。相反,两者是天然的伴侣,图书馆员不应该拒绝这门新知识‘亲属’,情报科学家也不应该对图书馆员怀有戒心。两方面都曾有过成见,而这一情况今后还会存在。”^[1]谢拉讲的“成见”延续至今。我国图书情报事业,总的讲,近几年来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理论研究一直未能为事业发展提供足够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而且有时还影响和束缚了事业的发展,限制了自身的研究范围和深度。这些年来,实际上图书与情报两者是貌合神离,两门学科的研究者们,竞相为本学科成为高深“学科”而创建新理论、新观点,其表现是理论研究的重心摇摆,热点多变,而对于近几年来图

书馆界面临“经济危机”和“信息饥饿”的严峻现实,却似充耳不闻。

在深化改革的形势下,索性让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两者分道扬镳,摆脱牵制,让各自在人类信息活动的这个大范围内,去探索、去开拓、去创造自己的学科新领域,或许更好。

“买椟还珠”引起的思考

“买椟还珠”的寓言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只要稍稍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图书馆界的许多工作人员,对文献中贮存的信息和知识,并不十分了解和注重,而对于其载体,却是较为熟悉、较为重视的。这种情况与“买椟还珠”简直有惊人的类似^[2]。

据笔者的经历和考察,有90%的图书馆工作者是一点也不了解和一点也不注重文献的知识内容的。以一般的大中型图书馆为例,并从文献入馆规程和业务机构的情况分析,熟悉和重视文献内容的人员数大约10%而已。占全部专业人员的百分比大致如下:

采访	编目	典藏	外借	阅览	参考	期刊	技术
2	3	0.5	0	0.5	3	1	0

在采访部门分工选购图书的人员,大抵仅凭书目上提供的简单信息——而且不少只涉及文献的基本特征,未涉及文献的基本内容——圈选购书。编目部门的分类人员,大抵也只了解文献的“皮毛”,对图书的序、跋、后记等看透就很不错了。至于典藏、外借、阅览等部门,日常差不多全是靠分类号或登录号工作。技术服务部门则更是尽与数字符号打交道。计算机进入图书馆,上述情况愈甚。以外借流通部门利用计算机为例,工作人员接过一个个读者递过来要借的图书,把握着扫描器对准每册书的“条形码”一扫而过。据说两秒钟可完成一本书的外借手续,比手工操作要提高功效60倍以上。然而,这个外借人员,连书名也不用看,何谈了解、注重和熟悉其知识内容呢?这难道不应引起我们思考么?

上述现象,其实质是:1、图书馆还要不要突出“人”的作用;2、将来是否会走向无“纸”社会;3、图书馆“馆”最终是不是不再需要了。对这些问题,国内外图

书馆界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关于 2、3 两个问题,国内的专业刊物已进行过较多的讨论^[3]。现仅就第一个问题略加探究。

图书馆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应运而生。图书馆作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保存文献的场所,历来是文化阵地的象征,一直成为人类文化繁荣进步的依托。它为人们进行新文化的创造、发展提供基础。人类的文化发展孕育了图书馆,图书馆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两者相互促进、依存。亘古以来,图书馆是以人文为本的,人在图书馆里起主导作用,他们的工作对象离不开文献的知识内容。

现代图书馆与古代图书馆比,尽管有着种种不同,但是,人文传统的本质则是相同的。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不例外。美国巴特勒(P·Butler, 1886~1953)的图书馆学理论就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强调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二是强调人文因素。谢拉在其代表作《图书馆学引论》^[4]中也说:“尽管图书馆学在逐渐地利用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同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人文主义的。”图书馆事业“主要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我们要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始于人文主义”。谢拉在他另一重要著作中也阐明了类似的思想:“我不反对科学,也不轻视它,科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我想现在应该是人文主义者说话的时候了,应该告戒你们,在应用数学方程式时不要忘记人这个大方程式,这才是最重要的。”^[5]被誉为图书馆学界的爱因斯坦、印度的阮冈纳赞在 1931 年创立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其前 4 条:书是为使用的;人有其书;每本书有其人;节约读者的时间。也是极其强调人的因素。

从图书馆学大师们的实践活动和理论著述中,可见他们都强调图书馆学的人文因素,即重视图书馆活动中工作人员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但是,也有与上述观点对立的。他们认为将来会是无纸的社会,甚至图书馆不久就会消失,所以人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然而事实是,我们正处在信息激增时代。随着信息量的激增,读者更难认识和获取到所需要的准确信息,这就需要对文献中的信息进行深层次加工,活化文献信息资源;对高层次的情报信息调研要求更高。比如跨入 90 年代,尽管美国电子图书馆已经崛起,但是它也不能否定馆内工作人员的主导作用。信息不是以静态的永久格式存在于图书馆内,需要馆员经常关心信息的更新情况,分析、研究各类信息数据库的质量,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服

务。

那么,在新时期我国图书馆将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怎样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呢?应该把图书馆由原来注重、熟悉、研究文献内容到现在只注意掌握载体形式特征再颠倒过来。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在电子时代、信息社会立于不败之地,扩大和深化自己的社会功能,体现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和自身价值。

图书馆要“下海”,不是靠“输血”

国内外书刊价格的持续猛涨给图书馆界带来连年不断的“经济危机”。据有关资料,全国人均图书馆事业费不过 0.12 元;我国公共图书馆 1988 年购书总经费为 6560 万元,全国人均只有 5 分钱^[6]。而美国图书馆 1990 年的书刊资料购置费为 45 亿美元,人均大约 22 美元^[7]。虽然我国图书馆事业经费逐年有所增加,如 1990 年比 1984 年国家拨给公共图书馆的总经费提高了 155.4%,但书刊价格持续猛涨,“水涨船不高”。1991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新购图书 731 万册,比上年减少 124 万册,年降 15%。各类专业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情况,同样反映出这一严峻形势。武大图书馆 80 年代初年新增藏书量为 11~12 万册,以后每年递减,1987 年减为 8.3 万册,1989 年为 4.8 万册,1992 年为 3 万册;1992 年比 1982 年减少 9 万册,10 年下降 75%。一方面是文献量的激增,如 1978~1987 年,世界刊物种类已从 6 万种发展 13.39 万种,即年均约增长 10%^[8];一方面是书刊入藏的大量锐减。难怪这几年不断有发各系统图书馆的呼吁:知识源泉的干涸,公共图书馆亟待“输血”,“藏书断层”、“情报饥饿”等等,不一而足。经费奇缺、功能下降、读者锐减、效益不佳等综合症引起的人才危机也相当严重。不少图书馆专业工作者不安心工作,人心思走,精神涣散,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给图书馆工作造成一股具有破坏性的冲击波。

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危机,陷于这般的窘境,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没有“造血”的功能。在大一统、模式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依赖国家供“血”。过去如此还可以生存,不过“发展后劲不足,服务效益平平”而已。今后则非彻底更换观念、根本改革体制,走自立自救、靠自身“造血”的路子不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信息、知识、文献是发

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以拥有大量文献、知识、信息为基本属性的图书馆,对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图书馆走自我“造血”的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既是国家建设所要求,也是自身取向、求生、改革和发展的必然。

我国图书馆界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种必然,他们率先探索,敢闯“禁区”,勇于对传统观念和服务手段挑战,大胆“下海”,搞各种经营创收活动,而不是躺着等待国家“输血”,坐吃“皇粮”。形式大致有三类:一类是非文献信息业务经营,如办商店、出租场地、开办录像厅、卡拉OK、舞厅等;一类是图书信息业务经营,即利用图书馆的业务优势,开展多种多种有偿服务,如出售图书、文具、开展打字、复印、装订及其维修等业务,开设语音室、视听室;再一类是向更高境界迈进,进行深层次改革,使信息转换为商品,着眼于“信息工程”、“信息系统”的建立,为使文献信息尽快有效地转换为生产力,变成社会财富充当媒介。不论哪种类型的经济活动,都不同程度地拓宽了图书馆业务的服务范围,深化了自身的服务内容,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典型的例子如:1992年10月29日南京金陵图书馆与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合办南京首届科技成果、经贸信息拍卖会。短短的两个多小时,有4项科研成果、3条经贸信息拍卖成交,总交易额达92.7亿元^[9]。辽宁省图书馆努力开发轻工、种养殖业、市场预测等方面文献,确立了“为地方工业服务”等10个服务重点,取得生产、科研方面的优秀成果5494个,创造间接经济效益达10.2亿元^[10]。上海同济大学图书馆开展中外文打字、复印和装订文献资料,为读者播放视听资料,及维修复印机等服务,1992年创收40多万元。1993年初他们又成立了以图书馆为基础、为国内外中小型企业提供科工贸信息服务的同达科工贸信息开发公司。这家公司是经国家教委批准的首家高校信息公司试点。图书馆还是原来的图书馆,不过更换了观念,就换出了一个“图书馆产业”来^[11]。国家对图书馆开展经营已制定了若干政策,为图书馆开展经营活动开了绿灯。

邓小平同志强调指示:“中国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作为政治、经济的反映并为之服务的图书馆,也只有深化改革才有出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经营意识是最重要的意识,到处充满竞争。不是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是在竞争中失败和消亡,经济不上去,图书馆要发展是不可能的;图书馆改革不深化,要继续生存下去则是困难的。为经济建设服务,发展生产力,应作为图书馆传统的多种职能以外的今后最突出、最基本的职能,应成为图书馆改革全部工作的中心。

过去几年图书馆界所探索的、国家所支持的图书馆改革,是要真正把图书馆建设成为有自我“造血”功能的、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实体。改革是有成效的。这是伟大的历史变革,是新时期直到跨入21世纪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的必然。

参考文献:

- 1 Shera, J. H. Librarianship,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UNESCO bulletin for Libraries, 1968, 22(2)
- 2 张德芳等. 信息、知识、文献. 图书馆学研究, 1992, (3)
- 3 黄绍纪. “图书馆”更名热当议. 图书馆, 1988, (5)
- 4 Shera, J. H.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asic Element of Library Service.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1976.
- 5 Shera, J. H. Introduction Relationship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JASIS March-April 1971, 76-80.
- 6 文勇. 公共图书馆亟待“输血”. 经济日报, 1989, 8, 20
- 7 Deborah Selsky. Libraries Expected To Spend \$ 4.5 Billion on Materials in 1990. Library Journal 1990, 115(13): 32
- 8 Malcolm Gety. The Economics of Research Librarie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IFLA Journal, 1989, 15 (4): 299-305
- 9 一条信息拍出十一万元. 新民晚报, 1992, 10, 31(9)
- 10 优秀成果5千, 间接效益10亿. 中国文化报, 1992, 9, 23
- 11 倪庆芝. 有感于图书馆“下海”. 图书馆杂志, 1993 (3)

黄绍纪 现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工作。通讯地址:武昌路珞珈山。邮编430072。

(来稿时间:1993-09-07. 编发者:翟凤岐。)